略论北魏前期音乐及其影响

◇翟景运

（青岛，青岛大学文学院，266071）

提　要：孝文帝迁洛之后的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胡乐的高度繁荣，都同北魏迁洛之前的乐府歌诗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渊源和基础。隋唐的胡乐，从曲调和歌辞来说多来自北齐和北周，但早在北魏迁洛之前，这种音乐民族构成的基本构成格局就已经形成。

关键词：北魏前期　胡乐　鲜卑化　胡化

无论拓跋氏还是慕容氏，其早期乐歌大抵都用鲜卑语演唱，也用鲜卑语记录，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① 在音乐、歌辞全部失传的情况下，就很难用惯常的方法和途径对这种音乐形态作出研究，故学者对北魏前期的音乐罕有涉及。孝文帝迁洛之后的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胡乐的高度繁荣，都同北魏迁洛之前的乐府歌诗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渊源和基础。隋唐的胡乐，从曲调和歌辞来说多来自北齐和北周，但这种民族音乐构成的基本格局却早在北魏迁洛之前就得以形成。本文拟结合统治阶级的特殊文化心态，及北朝文学创作水平的变化等因素，探讨北魏前期乐府歌诗形态得以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以期对它在古代乐府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从道武帝登国元年到孝文帝迁洛，就是本文论题在时间上的前后断限，也就是史家所说的北魏平城时代。

---

① 刘煦《旧唐书》，第29卷，志第九，音乐二，第10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一、《真人代歌》及北魏前期音乐中的胡族因素

鲜卑与乌桓同出于东胡民族，“其语言习俗与乌丸（桓）同”。① 史载鲜卑、乌桓“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② 这种出现在葬礼上的原始哀歌，同中古时代汉族所流行的挽歌颇为相似。史籍中存有若干关于北魏前期皇族歌诗活动的记载，可以说明鲜卑民族本来就有爱好歌唱舞蹈的传统。《魏书》卷15《拓跋仪传》载：“世祖（太武帝拓跋焘）之初育也，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喜，夜召仪入。……告以世祖生，仪起拜而歌舞，遂对饮申旦。”③ 太武帝神䴥三年（430）行幸广宁温泉，作《温泉之歌》以纪其事。④ 他还令乐府歌工历颂群臣，赞美“廉如道生，智如崔浩”。⑤ 不过同东晋南朝相比，北魏前期的歌诗活动在总体上还是显得十分寂寥。鲜卑拓跋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缺乏类似于两汉魏晋和南朝那样完善的乐府机关和乐府制度，因此她的歌诗生产、记录和消费完全没有相应的保障。

从力微到道武帝拓跋珪即位之前，拓跋部和其他鲜卑部族还是游牧部落，没有定居的城郭。游牧经济决定了鲜卑民族不可能有高度封建化的社会上层建筑。两汉魏晋历代相承的乐府机构，在早期鲜卑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即便是鲜卑民族的民歌民谣，在早期“刻契记事”的简陋条件下也没有得到多少反映。太祖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北魏建国，天赐三年（406）选择平城建都，到高祖拓跋宏太和十七年（493）为了迁都而建设洛阳，前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一个世纪是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关键时期。

天兴元年（398）冬，拓跋珪下诏让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

---

① 范晔《后汉书·乌丸鲜卑列传》，第90卷，第29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② 陈寿《三国志》，第30卷，《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第8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魏收《魏书·拓跋仪传》，第15卷，第3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魏收《魏书·世祖纪》，第4卷，第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魏收《魏书·长孙道生传》，第25卷，第6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观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① 同年，又由左丞相卫王仪率领百官，请道武帝身着衮服，仿照历代帝王追尊祖先，用《皇始》之舞，易服饰，行夏历。以上种种措施，都是在仿效、推行汉族帝王的制度。定律吕、协音乐，乃是拓跋珪在立国之初创设基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邓渊将北魏所得四方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相结合，改制出一套适合北魏朝廷使用的雅乐，自此之后，每年“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县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② 这里“燕”乃指慕容鲜卑部，“赵”指匈奴刘氏和羯族石氏，“秦”指氐族苻氏和羌族姚氏，“吴”则指东晋。《隋书》卷14《音乐志中》说：“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③ 邓渊所定音乐，既有拓跋鲜卑的民族特色，又羼杂着中原音乐的因素，而整体上则是鲜卑和其他胡族音乐为主导。据《魏书·乐志》，这些音乐的主要内容包括：

> 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
>
> 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之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④

《皇始》舞为太祖拓跋珪亲手所定，但它并非拓跋珪自己的创作，可能源自拓跋氏族部落时代所流行的某种舞蹈，经过加工改造而成，这种舞蹈“以明开大始祖之业”⑤ 为主题。《真人代歌》本是鼓吹乐，马上奏之，只有入乐府后始“与丝竹合奏”，才能脱朔漠土风而成为庙堂宴飨的雅乐。⑥《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

---

① 魏收《魏书·太祖纪》，第2卷，第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魏收《隋书》，第14卷，音乐志中，第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④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⑥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25卷，横吹曲辞五，第3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① 据魏收的介绍，《真人代歌》的内容大抵是歌颂鲜卑民族早期创业开基的史诗。两《唐书》的《乐志》都说它是北魏乐府《代歌》，到周、隋之世与西凉乐杂奏，原有的《代歌》150 章由于只有鲜卑音而没有汉译，理解者越来越少，以至逐渐失传。另外，《隋书·经籍志》还有《国语真歌》10 卷、《国语御歌》11 卷，从题目上看，同《真人代歌》一样，最初都是用鲜卑语演唱的乐歌。孝文帝迁都之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提倡汉语，禁断鲜卑语，鲜卑语言逐渐为大众所不能通晓，遂导致后来流传的鲜卑乐歌只有声音和乐曲，而无法探究其内容和意义了。

北魏是将《真人代歌》作为郊庙雅乐使用的。《真人代歌》当中包含着不少拓跋鲜卑之外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成分，比如慕容鲜卑、氐族等等。《旧唐书》卷 29《音乐志二》载："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郡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② 我们将《真人代歌》现存曲目同南朝乐府所保存的《梁鼓角横吹曲》相比较，可以发现其中有些曲目是重合的；借助《古今乐录》、《乐府诗集》的解题，可以考知《真人代歌》部分曲目的来源。六章当中，可知至少五曲来自拓跋鲜卑之外的北方少数民族。

一、《巨鹿公主》来自羌族。《旧唐书》卷 29《音乐志二》云："梁有《巨鹿公主歌》（按，指《梁鼓角横吹曲》），似是姚苌时歌。"③ 后秦国主姚氏，属于羌族。

二、《慕容可汗》和《吐谷浑》两曲大抵为慕容鲜卑早期民歌。吐谷浑是从慕容鲜卑中分离西迁的一支，立国于西北地区，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为吐蕃所灭，享国三百余年。《唐会要》卷 33《四夷乐》"北

---

① 刘煦《旧唐书》，第 29 卷，音乐志二，第 107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刘煦《旧唐书》，第 29 卷，音乐志二，第 107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刘煦《旧唐书》，第 29 卷，音乐志二，第 107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狄三国乐”条云：“吐谷浑亦鲜卑别种之一，歌曲皆鲜卑中出也，但音不可晓，与《北歌》较之，其音异。”①《太平御览》卷570《乐部八·歌一》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说，慕容廆“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于歌》”②（《魏书》卷101《吐谷浑传》、《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均有《阿干之歌》，“于”当为“干”之讹），这是慕容鲜卑喜歌《吐谷浑》的一个显著例证。又，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卷2《河水二》引全祖望语云：“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浑，因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惠渠。”③ 这一地带正是吐谷浑政权之故地。慕容廆作《吐谷浑阿干歌》之后，“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④ 然则《吐谷浑》歌在慕容燕时代就已经用作宫廷雅乐。吐谷浑音乐直到唐代仍然得以保存，而且其音乐性质与一般北狄歌曲有所不同。当慕容鲜卑的乐歌进入北魏乐府之后，即演变为“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企喻歌》源自氐族。《乐府诗集》卷25引《古今乐录》，说《企喻》“男儿可怜虫”一曲歌辞乃苻融所作。⑤ 苻融是前秦国主苻坚之弟，前秦苻氏为氐族，然则《企喻》为氐族乐曲，至少含有氐族音乐的成分。

四、《部落稽》可能同山胡族音乐有关。山胡，也称稽胡、部落稽、步落坚、步落稽，是一支族源比较难考的胡人，按照正史的说法，山胡是刘渊南匈奴五部的苗裔，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春秋时期就活动于陕西北部的山戎、赤狄的后人，还有人认为山胡中可能还夹杂着西域人种，血统非常复杂。北魏时期，山胡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的北部部落繁多，居住于山谷之间，一度是北朝内部的隐患，北魏末年更是掀起了大规模起义。

---

① 王溥《唐会要》，第33卷，四夷乐，第6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

② 李昉等《太平御览》，第570卷，乐部八，歌一，第3册，第25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③ 王先谦《水经注合校》，第2卷，河水二，《四部备要》本。

④ 魏收《魏书·吐谷浑传》，第101卷，第22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25卷，横吹曲辞五，第3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除了《真人代歌》以外，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北魏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① 悦般国鼓舞是否被北魏王朝用作雅乐不得而知，但它无疑使北魏乐府的胡乐成分更加浓厚。又《隋书·音乐志》所叙隋大业年间所确定的九部乐，其中《西凉》、《龟兹》、《疏勒》、《安国》、《高丽》等五部乐，都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从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手中接收而来的。其中《西凉乐》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中就享有很高的地位。《隋书》卷14《音乐志中》载：“天兴初……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② 又据《隋书》卷15《音乐志下》载，隋文帝开皇年间置七部乐，其一叫作“国伎”，《隋书》解释说：“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③

就现存史料来看，北魏音乐中大概只有《簸逻回歌》等少数乐章完全出自鲜卑。《乐府诗集》卷21“横吹曲辞”解题云：“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④ 道武帝天兴初年，邓渊奉诏“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⑤ 所谓“燕魏之际”，严格来讲乃是指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建天子旌旗、取并州、夺中山，到天兴元年（398）克邺、灭后燕、定都平城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后燕国主属鲜卑慕容部，然则“鲜卑歌”当是总括此时鲜卑各部音乐而言。《隋书·音乐志》有《大角》，凡七曲，可能与《簸逻回歌》同类，“其辞并本之鲜卑”。⑥

《真人代歌》题中所谓“真人”，很可能同汉族神仙道教之说有密切关系，因为这是秦、汉以来神仙家常用的称谓。《庄子》当中，所谓

---

①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魏徵《隋书》，第14卷，音乐志中，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 魏徵《隋书》，第15卷，音乐志下，第3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④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21卷，横吹曲辞一，第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⑤ 魏徵《隋书》，第14卷，音乐志中，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⑥ 魏徵《隋书》，第15卷，音乐志下，第3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真人"十分多见，所谓"真人"，"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① 同时"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② 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始皇帝三十六年，陨石于东郡，始皇帝不悦，乃使博士作《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③《文心雕龙·明诗》云："秦皇灭典，亦造仙诗"，④ 所指正是《仙真人诗》。《仙真人诗》久已失传，《乐府诗集》卷83"杂歌谣辞"《秦始皇歌》解题引《古今乐录》云："秦始皇祠洛水，有黑头公从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宝。'乃与群臣作歌。"歌辞云："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祠祭大泽，倏忽南临。洛滨醂祷，色连三光。"⑤ 这首诗大抵出于附会，并非秦代诗歌之旧，但无疑带有浓厚的神仙色彩。王逸《九思·守志》："随真人兮翱翔"，注云："真，仙人也。"⑥《魏书》卷113《官氏志》载，天兴三年（400）"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⑦《魏书·乐志》叙《代歌》事于天兴元年（398）至六年（403）之间，道武帝迷恋神仙道教长生不老之说，煮炼百药当即与此相关；推测《真人代歌》的命名，可能正是道武帝本人喜好的一种体现。又《魏书》卷105《天象志三》载，皇始元年（396），"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五十余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当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⑧ 这种关于"真人"的传言大概是道武帝操纵方士为他所制造的舆论。如果说《真人代歌》含有汉族文化因素的

---

① 《庄子·大宗师》，陈鼓应《庄子今注今释》，上册，第170页，中华书局，1983。

② 《庄子·齐物论》，陈鼓应《庄子今注今释》，上册，第81页，中华书局，1983。

③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6卷，第2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⑤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83卷，杂歌谣辞一，第1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⑥ 王逸《楚辞章句》，第17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魏收《魏书》，第113卷，官氏志，第29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⑧ 魏收《魏书》，第105卷，天象志三，第23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话，这就是唯一的一点，而且主要是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加以吸收和利用的。

《隋书》卷12“礼仪志七”说：“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① 其实不仅车服制度“多参胡制”，音乐方面同样是以胡族因素为主。北魏虽然在统一北方过程中陆续得到中原旧乐的遗存，却往往并不重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热情甚至远逊于某些南方士人。《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载，南齐初年，王僧虔写信给王俭，建议借南北通使的机会，派遣乐署中人充任出使北魏的散役，顺便寻访南方所缺的汉魏旧曲。他说：“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阙，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② 王僧虔是一个深通音律、对乐府歌诗也十分稔熟的人，曾经撰辑《大明三年宴乐伎录》，他之所以建议派人到北魏搜求遗乐，当是由于他了解到南方汉魏旧曲中有不少是从北方流入的。但是从作为汉魏旧乐输出之地的北魏方面来看，乐府歌诗当中基本上看不到中原旧曲的影子。

二、北魏前期音乐“胡风”、“国俗”杂糅的成因

《南齐书》卷57《魏虏传》云：“佛狸（太武帝拓跋焘小名）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③ 音乐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社会文化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鲜卑拓跋氏汉化过程中的阻力，造成鲜卑乐和胡乐的成分远远超出汉族音乐。

在永嘉之乱以后陆续进入黄河流域的各少数民族当中，鲜卑拓跋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相对较浅。北魏前期，鲜卑贵族的汉化是不自觉的，自觉的是鲜卑部酋对汉化的抵制。鲜卑部酋反对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

① 魏徵《隋书》，第12卷，礼仪志七，第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第33卷，第595－5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③ 萧子显《南齐书·魏虏传》，第57卷，第9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①

在由畜牧变为农耕、由迁徙变为定居的过程中，鲜卑拓跋部仍有许多原有的文化特质被保留下来，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平城时代的经济结构中，农耕并没有完全取代畜牧，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六年（421）所定税收制度中，有“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和“制六部民，养满百口输戎马一匹”等规定，② 北魏中央政府还有专门管理畜牧业的驾部尚书，可见畜牧仍然是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拓跋氏君主每年六月末都要到阴山“却霜”。《宋书》卷95《索虏传》云：“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绕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却寒也。”③ 虽然平城已经成为新都，但拓跋氏君主仍然在迁徙、射猎的草原生活传统中度过大部分时间。鲜卑人虽然欣赏中原生产的锦帛，却不愿意放弃传统的服饰习惯，太武帝拓跋焘曾经说：“国人皆着皮袴，何用丝帛！”羊肉奶酪是鲜卑人传统的主食，拓跋君主长期保持着这种饮食习惯，即使后来醉心中原文化、力主汉化的孝文帝，同样对这个传统执著固守。④《汉书》卷22《礼乐志》云：“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⑤《魏书·乐志》在叙述北魏前期雅乐的时候也引用了这句话，⑥ 这就是北魏前期雅乐为什么多是鲜卑乐、鲜卑语的根本原因。

北魏前期的皇帝对汉族士大夫和汉族文化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他们占领了广大的汉族地区，需要汉族士人帮他们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汉人又有很深的猜忌心理。清河崔逞历仕前燕、前秦和后燕，拓跋珪伐后燕，崔逞归附，拜为尚书，任以政事，录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省，寻除御史中丞。可见道武帝对崔逞非常重用，但北魏攻打中山时军中乏粮，崔逞建议取桑葚以充军粮，并且画蛇添足地引

---

① 陈寅恪《北魏前期的汉化》，见《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第240－253页，合肥，黄山书社，1987。

② 魏收《魏书·太宗纪》，第3卷，第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沈约《宋书·索虏传》，第95卷，第2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洛阳伽蓝记》卷三：“（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2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⑤ 班固《汉书》，第22卷，礼乐志，第10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⑥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用了《诗经·鲁颂·泮水》“飞鸮食椹而改音”的典故，引起道武帝的反感，后来借故将其处死。① 又《北史》卷20《贺狄干传》载，贺狄干奉拓跋珪之命出使后秦，被姚兴扣留，“在长安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回到北魏之后，“帝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② 于此可见道武帝对汉族文化忌讳之深。太武帝拓跋焘时代，鲜卑贵族同汉族士大夫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相当明显。《魏书》卷38《王慧龙传》载，王慧龙从南方逃到北魏，自称太原王氏之后，崔浩见了，说是“真贵种矣，”并到处向人夸赞，还将女儿嫁给他。“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拓跋焘），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③ 崔浩后来因修史获罪，“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④ 也与他记载、宣扬鲜卑部落早期落后状况，触怒鲜卑贵族有直接关系。崔浩之死是北魏前期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国史案不过是一个近因。

早期鲜卑拓跋氏文化相对汉族文化来说本来就有不小的差距，加上汉族统治者自秦汉以来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惯于歧视、压迫边疆少数民族，更加激起少数民族政权在心理上对汉人和汉文化的敌视。再者，鲜卑拓跋部本是马上民族，勇武善战是其长处，也是它赖以统一北方的基本素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一方面容易让人经过精神陶冶之后在言行上倾向文雅化，对整体战斗力有消解作用，另一方面，汉民族除了正面的战场厮杀之外，更加擅长使用政治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机巧百出，同样容易引起拓跋皇帝的警惕和忌讳。基于这些原因，北魏前期即使获得了中原音乐，往往也很少借鉴和利用。《隋书》卷14“音乐志中”载北齐祖珽上书云：“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⑤ 后来太武帝拓跋焘破赫连昌，曾经“得古雅乐”，及平凉州，又获“伶人、器服”，不过他们对这些中原雅乐，并没有全

① 李延寿《北史·崔逞传》，第24卷，第5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李延寿《北史·贺狄干传》，第20卷，第7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魏收《魏书·王慧龙传》，第38卷，第875－8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魏收《魏书·崔浩传》，第35卷，第8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魏徵《隋书》，第14卷，音乐志中，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盘接受，只是“择而存之”，或者“间有施用”。① 其他少数民族音乐大抵因为不存在上述容易引起拓跋氏贵族戒心的因素，所以很容易被他们接受。

第二个原因，汉族旧乐在战乱中屡经辗转，损失巨大，北魏政权接收之后很难在整体上加以吸收利用。

《魏书》卷108“礼志一”云：

> 自永嘉之扰攘，神州芜秽，礼坏乐崩，人神殄殄。太祖南定燕、赵，日不暇给，仍世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于经国仪轨，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阙遗。②

所谓“经国仪轨”，自然囊括礼制、音乐、器服、辇舆等诸多方面，这些文物制度在长期战乱的摧残之下，多半失散；而且当时拓跋氏忙于四方征战，对于国家的上层建筑根本无法投入太多的精力。《魏书》卷109“乐志”载：

>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儁平冉闵，遂克之。王猛平邺，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③

这段记载，描述了永嘉之乱以后中原音乐在北方政权间的流转，以及最终随着拓跋氏统一北方而为其所接受的情形。一套完整的音乐至少是包括乐工、乐器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它的完整性和生命力在战乱流离中显得相当脆弱。中原音乐经过汉、魏的流传和积累，为西晋乐府所继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屡次转手后，流失无疑已经相当严重。在支离破碎的基础上恢复它的原貌无疑相当困难。

第三，北魏迁洛之前汉文学创作极其凋落，在客观上限制了汉语歌

---

①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魏收《魏书》，第108卷，礼志一，第27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诗的发展。

从拓跋珪建立代国到孝文帝拓跋宏迁洛，北魏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家。《魏书》所收各种公私文翰，在孝文帝迁洛、大力推行汉化以前，大多是比较质朴的散文，绝少文采。《宋书·索虏传》录有魏太武帝拓跋焘写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两通书信，鄙朴如同口语，当是原貌。北魏初年的统治者对诗赋并不欣赏，对辞藻华美的骈文也缺乏兴趣。他们的公文除了达意之外，别无他求。北魏早期的诏令、章奏一般都用散体，但就散文艺术的标准来看，基本上没有什么佳作。《魏书·文苑传》所载文人都生于北朝后期。

北魏前期的皇帝不仅对汉语文学创作不重视，对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态度也很苛刻。《魏书》卷28《李栗传》载："栗性简慢、矜宠，不率礼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肃，咳唾任情。太祖积其宿过，天兴三年遂诛之。于是威严始厉，制勒群下尽卑谦之礼。"① 中原士族在拓跋氏统治之下动辄得咎，境遇相当可悲。宋隐临终时沉痛地告诫子侄："苟能人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为无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归食矣"。② 中原士族的身份是被征服者，尽管他们为拓跋政权服务，却多被降低品秩录用，而且没有俸禄。崔玄伯在中原士族中算得上是拓跋氏的宠臣，对拓跋氏建国的贡献极大，然而生活非常清苦。《魏书》卷24本传说他："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③ 高允是拓跋氏征服地区被迁徙代郡的渤海士族，是深得拓跋氏眷顾的首屈一指的重臣和文人，然而他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④ 这种情形同南方士族的优裕生活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如同天壤悬隔。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文学处于上层建筑中最高的层次，在"樵采自给"的物质条件下从事文学创作是极其困难的。北方汉语文学创作不发达，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歌诗，至少包括歌辞和音乐两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歌辞同音

---

① 魏收《魏书·李栗传》，第28卷，第6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魏收《魏书·宋隐传》，第33卷，第773－7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魏收《魏书·崔玄伯传》，第24卷，第6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魏收《魏书·高允传》，第48卷，第10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乐的关系相当密切，试想东晋南朝的吴声歌和西曲歌，如果没有清丽婉转的歌辞，单凭曲调恐怕很难博得当时贵族、文人的青睐，更不会对东晋南朝乃至后代文人诗歌创作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北魏迁洛之前的社会文化环境，既不具备从民间搜集歌诗的条件，显然也不可能培育出像江南文人拟乐府那样杰出的歌辞。

《文镜秘府论·四声论》说，自孝文帝迁洛之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① 认为北魏迁洛之后的文学创作“海内莫之比”，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确实反映出北魏后期的文学较之迁洛之前要繁荣得多。整体社会环境改变了，才会出现魏收、邢劭、温子升这样高水平的文人，才能带动乐府歌诗创作走向繁荣。

三、北魏前期音乐的影响

十六国时代各少数民族政权为北魏所统一，各族音乐也通过各种途径融合到北魏乐府，形成一种以鲜卑和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为主，杂糅汉族音乐影响的多民族音乐共同体。无论是北魏迁洛之后，还是北齐、北周，均在民族文化形态、民族关系方面同北魏前期有很大的相似性，此类后继王朝形成以胡乐为主的乐府歌诗格局，其乃至隋唐时代胡乐繁荣局面的形成，均有赖北魏前期音乐奠定了基础。

孝文帝推行汉化的决心和力度足以辉耀千古，汉化措施对鲜卑以及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推动作用彪炳史册，汉化措施在语言、服饰、族姓、婚姻等方面均可谓卓有成效，但在音乐方面却未能改变迁洛之前所奠定的以胡乐为主的基本格局。孝文帝以校正音声为务，着力搜求古乐，北魏乐府始盛。乐府音声审定、器物调试、歌辞取舍，编撰次第诸事，魏初邓渊当居首功，其后续成其事者还有高允、高闾等人。太和初年，孝文帝曾经力图恢复中原雅乐的旧日规模，但“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② 可见北魏前期的宫廷雅乐乃是以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为

---

① 逯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四声论》，第27－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②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主拼合而成的。孝文帝还曾让高闾审定音乐，但“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崩，未几，闾卒”。① 孝文帝恢复传统雅乐规模的努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克实现，虽然在乐舞数量上有所增益，但以“方乐之制”和“四夷歌舞”为主的北魏雅乐形制仍然延续下来。直到北魏亡国，北齐、北周并立的局面形成之后，这种体制依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北齐、北周，甚至隋、唐皇族，大抵渊源于北魏的六镇军人，汉化程度本来就不深，而且六镇军人是一个执著保持鲜卑化的武装集团，六镇起兵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隋、唐皇室的祖先虽然从血统来说都是汉人，却早已深度鲜卑化了。在北齐和北周，王公贵族所用的语言，主要还是鲜卑语。

北齐皇族高氏虽然号称渤海蓨人，但史书所载世系极不可靠。齐文宣帝曾经说他的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北齐皇室如果不是出自鲜卑，就是完全鲜卑化了的汉人。汉人向往南朝文化或者表现出南朝人的某些作风，就会遭到北齐统治者的极度反感。文宣帝因为王昕“疏诞非济世所须”，将他削爵为民，诏书说他“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致。推此为长，余何足取”。② 槟榔是南方士人常用的物品，《洛阳伽蓝记》城东景宁寺条载杨元慎嘲笑吴人“口嚼槟榔”；③《南齐书》卷22《豫章王嶷传》载，萧嶷临终诫子当守俭约，祭祀只设“香火、槃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④ 孙搴因为通晓鲜卑语而为人所重；祖珽最初因为通晓鲜卑语而得到推荐，但因为是汉人而终不能做领军。⑤《颜氏家训·教子篇》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⑥ 同书《省事篇》又说某两人经史文章书法无一可取，仅鲜卑语略得梗概，便可称“朗悟”之士。⑦ 高欢进攻北周的

---

① 魏收《魏书》，第109卷，乐志，第28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李延寿《北史·王昕传》，第24卷，第8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第1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④ 萧子显《南齐书·豫章王嶷传》，第22卷，第4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⑤ 李延寿《北史·孙搴传》，第47卷，第16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⑥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1卷，第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⑦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1卷，第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玉壁，为韦孝宽所败，他叫斛律金唱《敕勒歌》并且自和之。《乐府诗集》卷86《敕勒歌》解题引《乐府解题》云："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北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①

北齐社会弥漫着一种大鲜卑主义的气息，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较之北魏前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缪钺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中说："北齐一代，鲜卑势盛，汉人虽数次起而相争，欲抑黜鲜卑，整顿政治……然卒不能胜鲜卑而归于失败，北齐政治遂始终不上轨道，以讫于亡。"②《北史》卷5《魏孝武帝纪》："（高）欢遣四百骑迎帝……即位，用代都旧制。"③《北齐书》卷21《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④ 相反，北齐对胡族文化不仅不排斥，而且乐此不疲。北齐鲜卑或鲜卑化贵族，起用大批西域胡人专门从事音乐、舞蹈的创作和表演，因此陈寅恪先生指出北齐文化存在西胡化的倾向。⑤ 我们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指出，北魏前期的音乐如《真人代歌》等，除了以鲜卑本族音乐为主体之外，吸收最多的就是其他胡族的音乐；它的组成结构和艺术特质表现出对胡族音乐的特殊亲和力，对汉族音乐的吸收反倒比较保守和谨慎。就这一点而言，北魏、北齐一脉相承且愈演愈烈。

北周不像北齐那样大鲜卑主义流行，专以欺凌汉人为事。但这是因为关中地区汉族高门势力微弱，不能和胡人统治者相抗衡，并不说明北周鲜卑化和胡化的程度就比北齐轻。《周书》卷26《长孙俭传》载："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客惶恐不敢仰视。"⑥ 可见北周鲜卑文化气氛同样十分浓

---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86卷，杂歌谣辞四，第1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② 缪钺《读史存稿》，第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③ 李延寿《北史·魏孝武帝纪》，第5卷，第1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李百药《北齐书·高昂传》，第21卷，第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⑤ 陈寅恪《北齐的鲜卑化和西胡化》，见《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92－300页，合肥，黄山书社，1987。

⑥ 令狐德棻《周书·长孙俭传》，第26卷，第4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

厚。因此史家说他们“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① “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②

整个北朝境内都有大量的胡人活动，其中既包括月支或昭武九姓胡人西迁前后已入居中国者之后裔，也有九姓在中亚建国以后才进入中国的胡人。《洛阳伽蓝记·城南·宣阳门》“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条云：

> 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阛阓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③

在北魏首都洛阳定居的万余家西域胡人，在东魏迁邺的时候随之东徙。北朝皇族鲜卑化、西胡化的倾向，以及鲜卑化政权同其他胡族往来的频繁，必然带动文化上的交流，这在音乐方面表现尤其显著。《隋书》卷14《音乐志中》叙述北齐音乐云：

> 杂乐有西凉、鞞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④

又如《隋书》卷14《音乐志中》载：

> （北周）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欵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

① 魏徵《隋书》，第14卷，音乐志中，第3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刘煦《旧唐书》，第28卷，音乐志一，第10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第144－1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④ 魏徵《隋书》，第14卷，音乐志中，第3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①

隋文帝开皇年间置七部乐，炀帝大业中置九部乐，连同唐太宗时代所颁布的十部乐，都以胡乐成分占绝大比例。从根本上说，自北魏到隋、唐，胡乐的繁荣发展同北方少数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北魏的建国和统一北方各族，又是促成各族音乐熔为一炉的直接动因，北魏以后诸朝代胡乐地位极其突出的乐府歌诗的基本格局，也是在北魏前期得以奠定的。汉、魏、西晋以后，以相和歌和清商三调为代表的清商旧曲渐趋衰落，伴随着政治上南北分裂格局的形成，南北政权内的乐府歌诗也各自开辟了不同的道路。南方逐渐形成以吴声、西曲为主要内容的清商新声系统，北方则在鲜卑乐歌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多民族音乐交汇集中、并肩发展、共同繁荣的胡乐系统。隋、唐帝国在北方政权的基础上取得全国统一，而此时南方的清商新声系统也因过度雅化而衰落，北方胡乐系统则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显示出充沛的活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平城时代的北魏政权，虽然甫离朔漠，制度多阙，而且戎马倥偬，烽火不息，但由它所草创的乐府歌诗体系，影响可谓至深至巨。

作者简介：翟景运，男，1978 年生，山东兖州人。200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青岛大学文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客座讲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在《国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过《晚唐律赋题材的拓展与闽地律赋创作的繁荣》、《再论相和歌及其与清商三调的关系》等论文十余篇。独立完成青岛大学引进人才研究项目《晚唐骈文研究》，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汉—唐郊庙歌辞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的子课题研究。

① 魏徵《隋书》，第 14 卷，音乐志中，第 34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